第七讲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导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要和平民主。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即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它急于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半年左右时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在全国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采取避战观战以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蒋介石有这样的既定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严重危险。

尽管不顾人民要求，发动全面内战，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但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也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所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不得不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为欺骗公众舆论，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中共发出3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

视频：《重庆谈判》

一、重庆谈判争取和平民主

（一）重庆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在当时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因为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也是有利的。而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的同时，党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必要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

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这个《通知》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和主张。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43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这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二）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它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由于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必要的自卫作战，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方针并没有因军事进攻的失利而有任何改变。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11月19日，在重庆，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由抗战开始后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特务分子的捣乱，昆明3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斗争。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西南联大等校，并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重庆、上海等地也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

课或游行示威等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时难以实现其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和控制整个中国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虽然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切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这些协议的。由于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

能行之于中国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政协会议还在进行时，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上起哄并且动手殴打，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大哭大闹，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会场。蒋介石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终于成为一纸空文。事态的发展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作出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全面内战的爆发仍不可避免。这迫使党在竭尽全力努力维护政协协议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二、奋起自卫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全面内战爆发

尽管有了政协协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其实已经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蒋介石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以25个旅，约21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狂妄地宣称“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在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

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进行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同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又被暗杀。显然，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

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地确定了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所以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他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得逞，那么整个中国必然完全处在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之下，并且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我们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明显的优势。蒋介石所发动的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必将获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最基本的依据，“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此，在农村中，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二）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其中，前八个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四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依恃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各解放区，企图一举消灭人民军队。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沉着应战，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

动迎击国民党军队 12 万人的进攻。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接连进行 7 次作战（即苏中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5 万余人。苏中战役的重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

在战争的头 4 个月，即从 1946 年 6 月下旬至 10 月，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 153 座，人民军队也收复了城市 48 座，并歼敌 29.8 万人。10 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势头开始降落。从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 月，人民军队又经过 4 个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总共达 41 万人；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 87 座，人民军队则收复和解放城市 87 座。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进一步受挫。它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破产。

从 1947 年 3 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刚于 2 月下旬采取突然行动在莱芜地区全歼南犯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 5.6 万余人，压下了敌军的气焰，并有利于华东野战军全力向南。3 月初，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 60 个旅约 45 万人，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战场发起新的进攻。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5 月中旬，终于抓住战机，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至 7 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 25 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 2 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 1/10，处于绝对劣势。他们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然后于 3 月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以便“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于撤离延安后 45 天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而后转战西北方向，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 2 个旅。到 8 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即从 1947 年 3 月至 6 月的 4 个月内，解放军在东北、

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也开始局部反攻，人民军队收复和解放了 153 座城市，并歼敌 40 余万人。总计从 1946 年 7 月起至 1947 年 6 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内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 8 个旅，共歼敌 112 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 190 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三、第二条战线声势浩大

（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以 1946 年 12 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 年 12 月 30 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由此掀起。抗暴运动是由美国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引起的。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截至 1947 年 1 月 10 日，12 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 14 个省 26 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 50 万人。抗暴运动表明中华民族不可侮。这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了美国干涉中国的活动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7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 月，爱国学生掀起了一场比上一年底开始的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5 月 20 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 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同一天，在北平，7000 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这就是五二

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 60 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五二〇运动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发展在全国。

（二）人民运动的广泛开展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 年间，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 320 万工人举行罢工。5 月到 6 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 40 多个大小城镇。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

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这就是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进行镇压。3月14日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四、人民军队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一）挺进中原和战略进攻的全面展开

人民解放军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指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即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部队首先在鲁西南地区打开南下的通道，接着长驱南征，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经过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在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质、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歼敌5万余人，建立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一次大胆而果断的战略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智慧和勇气。这一行动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这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同年，林彪、罗荣桓率东北民主联军相继发起秋季、冬季攻势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随后进驻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西柏坡村。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反动派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要完结了。

（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1947年7月，中共在河北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在解放战争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土地制度改革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源泉，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得到巩固。

（三）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经济方面，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方面，重申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实践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党的十二月会议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

（一）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继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10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

（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抉择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

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等。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三）协商民主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五一”号召。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六、伟大的战略决战与全国解放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军都十分有利，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中共中央选定首先从东北战场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在山东战场上揭开的，这就是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集中强大兵力对济南发动攻击，经8昼夜激战，歼敌11万人，取得胜利。这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

辽沈战役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截至这次战役结束的当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从此，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淮海战役

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与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展开决战。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11月6日至22日是第一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的黄百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从12月16日至下一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华北、东北军区地方部队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解放了北平和天津，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对战略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它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组织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它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从此，国民党政权呈现土崩瓦解之势。这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比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提供情报和做傅的工作）。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视频：《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渡江战役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其他战役，国民党军主力基本已被歼灭，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蒋介石为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组织长江防御。中共中央军委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和上海。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渡江战役历时 42 天，歼灭国民党军 43 万余人，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案例：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第一个大的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知悉南京解放，毛泽东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百万雄师过大江”这句，是渡江战役的生动写照，充分表达了一代伟人的欣喜激动之情。

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共两方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灭，残余的兵力虽有 204 万，但正规军只有 146 万。加之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的全面失败，不但丧失了向解放军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战争中发展到 358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 218 万，装备也大大改善，并且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跨过长江天堑、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

早在 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就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号令：“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为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1 月 22 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1949 年 4 月 1 日，张治中率团赴北平谈判。

鉴于蒋介石和李宗仁都缺乏真正和平的诚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做战斗渡江的准备。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 1949 年 2 月 3 日至 3 月 20 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 7 个兵团 24 个军及地方部队共 100 万人，准备于 4 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南京）沪杭地区。中央军委还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

国民党政府最终于 4 月 20 日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同日，我军开始按计划实施渡江战役。

棋高一着的战役部署

渡江战役共分为三个阶段实施，人民解放军先是横渡长江，克服天堑，突破江防后更是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第一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南京（4月20日—23日，历时3天）。中、东、西突击集团发起渡江作战后，均在一夜之间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战至23日，东集团主力切断和控制了宁沪铁路，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1个团首先进入国民党总统府，南京解放；中集团一部占领芜湖；西集团攻占贵池、青阳等地。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占领武汉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牵制了华中地区国民党军，保障了西集团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至23日，人民解放军3个集团展开于长江以南，深入敌人防御纵深30—70千米，为下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阶段：合围歼灭芜湖、南京、镇江逃敌，占领浙赣铁路（4月24日—5月11日，历时17天）。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国民党军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据此，我军调整了部署，三野命令东集团和中集团主力迅速展开追击，在郎溪、广德之间完成战役合围。战至4月29日，歼灭国民党5个军8万余人于郎溪、广德之间。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5月4日—7日，西集团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千米的浙赣线，切断了国民党军两大集团的联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浙赣线组织防御、反击，夺回沿江阵地的企图。

第三阶段：攻占上海，歼灭国民党守军主力（5月12日—6月2日，历时22天）。郎溪、广德围歼战后，华东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只剩下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部率主力8个军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据此，我军进一步调整了部署。三野第七兵团向浙东、浙南进军，解放浙江全省；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等地的警备任务；第九、第十兵团共8个军围困上海。二野主力在浙赣线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的干涉，保障三野解放上海，另以一部向闽北、赣中地区进击，相机占领南昌。四野先遣兵团相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为四野尔后进军中南创造条件。

5月12日，三野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战至27日，上海解放，共歼敌15万余人。5月17日，四野攻占武汉。5月22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南昌。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宣称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共歼敌43万余人，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的广大地区，以及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突破长江天堑，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创造了重要条件，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视频：《渡江战役》

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4月23日，解放军

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于 5 月 27 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

七、进京“赶考”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世人所瞩目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这一新型的国体为基础，“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政体，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加以明确。毛泽东在全会结论中申明不采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全会还强调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批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基础和根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度自信的深度和厚度。

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要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此中心工作服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不要在这种攻击面前打败仗。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确立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中国革命由此掀开新的历史篇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案例：“进京赶考”考什么

1949 年 3 月 23 日，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毛泽东望着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进京”意味着执政，“赶考”是要接受考验。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是“赶考”；

巩固政权，建设新中国是“赶考”；江山永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赶考”。

“赶考”永远在路上，那么“赶考”究竟考什么呢？

考信念

“必须做到信念过硬，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主席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信念过硬”。对个体来说，信念是指引方向的航标灯、修身立业的压舱石；对政党而言，信念凝结着初心与使命，更是立身之本、正气之魂、力量之源。但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信念动摇，丧失了先进性和纯洁性甚至违法乱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赶考”路上，对信念的考验也必将是严峻的、漫长的。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只有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才能筑牢政治灵魂，挺起精神脊梁，把准人生观、价值观的定盘星，练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

考精神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同样，一个人在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人就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创造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业绩。无论是呼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董存瑞，还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雷锋；无论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林俊德还是“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的于敏，他们不仅铸就了事业的高峰，更铸就了共产党人精神的高峰。与他们相比，那些碰到矛盾的绕道者、遇到困难推诿者、舒适安逸的享乐者、利益面前的患得患失者，应该感到汗颜。“进京赶考”很重要的一道考题，就是如何面对长期和平环境的考验。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把这道考题答好，积极进取、不懈奋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奔跑的姿势拥抱明天的梦想。

考作风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骄傲、麻痹、松懈等情绪，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制定了“六条规定”；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时间跨越60多年，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不变的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严治党的决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从南湖红船启程那天起，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人民群众正是从党的优良作风中，从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初心，汲取团结奋斗的动力。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赶考路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只有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时刻防止骄傲自满、享乐主义的滋生，持续不断地正风肃纪，围绕为基层减负，切实解决形式主义突出的问题，把“三严三实”的要求

落实到工作生活中，才能取信于民，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考能力

早在80年前，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习近平强军思想中，关注最多的是“强军兴军”“能打胜仗”，“胜战之问”敲响的是忘战必危、怠战必败的警钟，激励我们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兵者国之大事；将者，国之辅也。纵览国运兴衰，兵弱将无能乃国之最大患，民之大辱。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历史悲剧。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挺立腰杆、扬眉吐气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我们党有一支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赶考路上，只有牢固树立建为战、训为战、一切为战的观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才能使军队战斗力提升的速度超过战争到来的速度、军事斗争准备的速度超过敌人伸出战争魔爪的速度，从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新时代书写新的荣光。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面对历史和未来，再次强调“赶考”：“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的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赶考永无止境，赶考远未结束。只要我们永远保持赶考的心态，涵养赶考的素质，满怀信心，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就一定能跑好新长征路上的每一棒，确保如期完成任务，交出优异的答卷。

八、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奠定了后来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筹备成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从1948年8月开始，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后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平津战役结束后，他们陆续到达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共同筹建新中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隆重开幕。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视频：《新中国共同纲领诞生记》

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

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人民军队和军事建设，《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

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文化教育，《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等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 月 1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并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斗争纲领、方针、政策；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勇于坚持真理并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第二，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支军队，必须有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相结合，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

第三，必须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极强大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势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对资产阶级同盟者执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发展进步势力，孤立右翼势力，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虽历经千辛万苦，却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

第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尽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但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决不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任何别国身上。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对本国情况的深刻了解，制定正确的政策，紧紧地依靠本国人民，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一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 1/4 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 1949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 28 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小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巨大的努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坚决以积极防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党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